

商务印书馆

主编 刘东

中國學林

2005 3/总 第二十三辑

CHINA SCHOLARSHIP Vol.6 No.3

中國學術

述生



2005 3 / 总第二十三辑

主编 刘东

商务印书馆

2005年秋·北京

卷 首 语

我们所讲的“中国学术”，绝非仅限于某一地理疆界之内的学术活动，否则不光杂志的论域和器量会太受限制，而且就知识生产的世界现状而言，也实在难以保证足够的学术量。由此从外延来讲，凡是来自广义“文化中国”的学术创造，即使它并非大陆人甚至中国人的创造，仍要属于“中国学术”；而从内涵来讲，凡是理应纳入当代精神视野的重大话题，哪怕它超越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具体关切，也仍要属于“中国学术”。

论文栏第一组致力于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研究，显出文明间的跨越是其来有自的，只不过早先的主要边界并不在中西之间。刘迎胜提出了一个既有难度又有兴味的问题：明初人出使外番时究竟以何种语言交流？作者基于同时以汉、波斯与泰米尔三种文字刻成的锡兰山碑推测：后两种文字正是郑和船队的主要外交语言；更佐以其它材料（如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推断：元亡以后，波斯语在中国的官方语言地位虽不复存在，但其作为外交语言的地位仍保持了一段时期，故明初时无论是沿陆路出使西域还是沿海路下西洋，均以它为外交语言。陆扬比较了中古留下的多种鸠摩罗什传记，并对之进行了语境化和历史化的诠释。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史家充分调用历史与想像资源，在凸显传主与其母耆婆及中亚僧团间的精神联系、展现传主过人智慧与佛教修行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刻画传主远到异域传教的孤独与挫败心态等方面，进行了持续努力和不断修正；可以想见，这类史书中的大量叙述细节，不仅反映了当时佛门与公众对传主的评价与想像，也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土时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响与制衡。

第二组聚焦于明清小说中的性话语。陈建华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综合了三个不同的向度：从叙事传统的角度，指出小说中的视觉特别是偷窥视

角,在人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从全知叙事到有限叙事的历史性转折;从视觉文化的角度,指出小说中对私生活和偷窥的兴趣,反映出随着晚明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私密性“阅读”的新型要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指出潘金莲的“恶”眼虽然蕴涵着对女性的诅咒,但对新的“视力”的召唤却亦反映了传统伦理的恐惧,同时也带来了性别天平出现“阴盛阳衰”的吊诡。商伟对《才子牡丹亭》的研究,强调了明末和清初间的连续性:这部成书于康熙、雍正年间,刊行于雍正、乾隆之际的评注性著作,其牵强的注释似乎专门围绕着性话题,表明晚明之风其实到十八世纪上半叶仍未消歇。作者缘此认为,这种颠覆性的情色诠释,既以王学为其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标志着王学的逻辑极致;它的阐释内容和方法体现了晚明以来文学实践的内在趋向,故其意义便只能参照这些作品的母题和叙述模式来理解。

第三组聚焦于日本的江户“兰学”(即荷兰之学)。近来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上世纪初叶从日本涌人的大量外来语,发现那里潜藏着许多文化误读的重大案例。然而,那些以汉字为假象的日语外来语,最初在其本土语境中又是怎样形成的?沈国威道出了其中的“所以然”。作者指出,日本近代的兰学从《解体新书》的刊行算起(1774年),迄至来自中国的汉译西籍开始自由输入(1860年前后),总共进行了80余年。在此期间,兰学家们面对西学“抗颜强译”,并在实践中总结出了译词三法——即利用中国典籍词语的“翻译”、摹借或汲意造词的“义译”,以及万不得已而为之的“音译”;而大量利用汉字拼合起来的新词,正是在中国典籍中没有现成对等词语的困境下,被兰学家们根据“义译”的方法创制出来的。赵坚又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综述了日本兰学的发生、发展与特征。作者还指出,兰学这种“洋学”一开始又称“蛮学”,是作为“汉学”(主要是传统汉医学)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称呼不仅包含着对其研究对象(“蛮人”)的鄙夷,也意味着兰学和汉学之间的高下之分。不过,兰学和汉学并非总是这般水火不容,反而很快就发生了融合,到后来后者竟成了前者的“素养”和“媒体”。准此才可以理解,后来从晚清输入的汉译西籍(如《万国公法》),何以又对幕末的兰学有所推动。

评论栏围绕着“历史与现代性”的关联。高毅基于欧洲的史实认定，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空前觉醒，以及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由此，所谓“现代性”应是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三位一体，而自由与平等两大价值之间的张力则是它的内在动力源。作者的辩护是，两个多世纪来现代文明在其发生、成长和扩散历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多是由各种对抗现代性的前现代因素所诱发催生，并非缘于现代性本身正当性的不足。叶文心基于史家的敏感，指出高速起飞的前景如何促成了上海地方史资源的重新分配，以至以往革命史对于阶级斗争和外来压迫的强调，也在新的史学话语中变成了“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辩。借助于这种雄辩，新的上海史著述就重塑了人们的记忆，也为该市主动谋求国际化的战略建构了历史基础。不过，同样出于史家的敏感，作者亦指出九十年代的上海虽然提出了“主动开放”的战略指标，其历史条件却与“被动开放”的三十年代颇有不同。

讲坛/通讯栏，发表了丁尔苏基于本刊2003年春季号上的钱钟书遗作——〈欧洲文学中的中国〉所进行的联想式发挥。作者再次以《世界公民》及《在中国屏风上》为例，讲述了关于中国的不同观念是如何以及为何被异国挪用的。

最后再回到起初的话题。刚刚从瓦格纳那里读到了这样一段望而生畏的文字：

中国学研究发生在一个多语言的世界。除了中文以外，学者们还在用日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及其它语言撰写重要的著作；而相当的历史资料则在另一宽泛的语言跨度里传布，从梵文到吐火罗文，从拉丁文到葡萄牙文，更不用说日文和韩文中对古汉语的运用了。几乎没有学者敢于声称自己在用所有这些语言中的哪怕一小半来从事研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学术原则却依然有效：关于一个课题的所有重要的资料和研究均需要顾及，不管它们传布在哪种语言中。（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序言）

但转念想来，不正是因为这项事业既如此艰难，又如此广阔，我们才如

此渴望去调动普天下的积极因素，来共同书写——乃至于共同造就——那个早已成为世界性话题的、充满迁移张力的中国性吗？

刘东

于京郊静之湖

目 录

| | |
|--|-----|
| 卷首语 | 001 |
| 论 文 | |
| 刘迎胜 明初中国与亚洲中西部地区交往的外交 语言问题 | 001 |
| 陆 扬 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 佛教文化与史学 | 030 |
| 陈建华 欲的凝视:《金瓶梅词话》的叙述方法、视觉 与性别 | 091 |
| 商 伟 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子牡丹亭》的评注话 语及其颠覆性 | 122 |
| 沈国威 日本的兰学译词与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 | 152 |
| 赵 坚 兰学发展和汉译西籍 | 187 |
| 评 论 | |
| 高 敏 从历史看现代性 | 209 |
| 叶文心 现代化与历史源:上海城市史的当代书写 | 230 |
| 讲坛/通讯 | |
| 丁尔苏 对“他者”的挪用:英国文学中关于中国的 相反观念 | 244 |

书 评

- 罗威廉:《救世:陈宏谋和十八世纪中国精英的思想》(鲁慎) ……260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陈时龙) ……267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
 政治, 1870 – 1930》(李德英)……………272
 司昆仑:《文明化成都:中国的城市改革, 1895 – 1937》
 (彭姗姗) ………………279
 盘剑:《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
 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张英进)……………284
 白露:《中国女性主义中的女性问题》(何冬晖)……………293
 约翰尼斯·费边:《具备一种态度的人类学》(赵旭东) ……298
 宝森:《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何明洁) ………………302
 安索尼 T. 克罗曼:《迷失的法律人:法律职业理想
 的衰落》(徐品飞)……………312
 迈克尔·泰格特:《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328

Contents

| | |
|---------------|-----|
| Preface | 001 |
|---------------|-----|

Articles

| | |
|---|-----|
| Liu Yingsheng, On the Diplomatic Languag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Early Ming China and Midwest Asia..... | 001 |
| Lu Yang, Reading Biographies of Kumārajīva: A Study of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nd Historiography | 030 |
| Chen Jianhua, The Gaze of Desire: Narrative method, visuality, and gender in Jin Ping Mei Cihua | 091 |
| Shang Wei, The Commentarial Discourse and Subversive Meaning of Caizi Mudan Ting..... | 122 |
| Sheng Guowei, Dutch Learning (Rangaku)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Chinese Words in Modern Japan..... | 152 |
| Zhao Jian, The Development of Dutch Learning (Rangaku) and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Language Works into Chinese | 187 |

Reviews

| | |
|---|-----|
| Gao Yi, On Moder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209 |
| Yeh Wen-hsin, Modernization and Historical Resource: Contemporary Writings on Shanghai City History | 230 |

Forum/Correspondence

- Ding Ersu Appropriation of the ‘Other’: Contrasting
Notions of China in British Literature 244

Book Reviews

- William T. Rowe, 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Lu Shen) 260
- Lu Miaofen: The Scholar – Bureaucrat Communities
of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History, Thought,
and Practice. (Chen Shilong) 267
- Wang Di,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 – 1930.
(Li Deying) 272
-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 – 1937 (Peng Shanshan) 279
- Pan Jian: Selection, Interaction, Integration: Cinem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Shanghai Culture (Zhang Yingjin) 284
- Tani E. Barlow,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He Donghui) 293
- Johannes Fabian, Anthropology with an Attitude
(Zhao Xudong) 298
- Laurel Bossen,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He Mingjie) 302
- Anthony T. Kronman, The Lost Lawyer: Failing Ideal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Xu Pinfei) 312



| | |
|---|-----|
| Michael Taggart, The Province of Administrative Law (Jin Zining) | 328 |
|---|-----|

明初中国与亚洲中西部地区 交往的外交语言问题

刘迎胜(南京大学)

一、问题的提起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是具有语言。学界主流认为，人类曾两次走出非洲。现代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欧亚大陆上的直立人是不同的种属，而前者取代了后者。现代人类语言的产生，大致在现代人散居世界各地之后。因为地理的隔绝，散居各地的人类集团之间起初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世代的遗传和种群之间的隔离使不同种族与语言得以形成。在远古时代，由于各地人类集团之间相距很远，相互很少接触。不同种族的人们即便偶然相遇，在语言上也多半不能互通。随着历史的推移、自然条件的变迁和种群的繁衍，散居世界各地的人群的活动范围都在不断扩大与变化，使得不同种群人类的地理覆盖区之间出现重叠。种群分布重叠区的存在使不同种群的人类之间的接触不但成为可能，并逐渐频繁起来。

不同文明的人类之间相遇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互了解、交往与交流的需要，这时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是不可避免的。周代就将从事东南西北四方语言翻译的译员分别称为“寄”、“象”、“狄鞮”和“译”。这四个称谓可能与译员所通之语言有关。其中之“狄鞮”有可能是突厥语 *tilçi* (“舌人”、“通事”、“译员”) 的音译。¹

世界各民族大小不一，有强有弱，文明发展程度有异，文化影响更不相

¹ 热扎克·买提尼牙孜主编，马维汉等撰：《西域翻译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12页。如此说成立，则说明操突厥语的民族当时已与华夏为邻。

同。因此不同的民族的语言在文明与民族间交往中的作用也不相同。强势民族的语言往往得到更多的运用，弱势民族的语言则较少有机会在族际交往中使用。自然选择的结果，使某些民族的语言超出本民族活动的范围，成为某一地区的各族交往时所自动选择的族际交流语言，即所谓之 *lingua franca*，有如英语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

明初是中世纪亚非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代。明成祖派遣郑和率舰队七下西洋的活动，不仅是古代中国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古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外交活动。同时，明成祖还不断派使团沿陆路向中亚、西亚出使，并接待外番的来访。外交活动既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又是具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民族间的人们的交流。不管是官方的外交活动还是民间交往都离不开语言的交流。本文所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明朝出使外番时所使用的外交语言问题。

二、锡兰山碑

郑和等率船队第二次出洋路过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时，曾对当地佛寺布施，并立有碑记。郑和立碑石之事，虽不见《明实录》提及，但明人严从简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中使郑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国，赉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其寺”，² 虽未明确提及立碑之事，但足见明人知郑和布施之事。

郑和及其船队在十五世纪上半叶横行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几达三十年，但至今遗留海外直接事关其航行的文物却不多。今东南亚各国所有者无非一些纪念性建筑或与后人传说有关之物。据文献记载，郑和在远航途中曾于海外他处立碑，但今多数不知所终，存者仅有锡兰山碑。故此碑成为研究郑和海外活动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按国外学术界的说法，锡兰山碑乃由工程师托马林（H. F. Tomalin）于

²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卷，“锡兰山”条，第312页。

1911 年发现于斯里兰卡南部港口伽勒 (Galle)³ 的一个靠近克里帕路 (Cripps Road) 的一条管路 (culvert) 之中。⁴ 在今日伽勒尚有一个市政行政区 (Municipal ward) 和一全次级邮政所 (sub-post office), 在僧伽罗语 (Sinhala) 中被称为 Cheena Koratuwa, 其意为“中国码头”。⁵

但实际上, 在工程师托马林之前, 此碑似已有中国人提及。据清王韬《漫游随录》记载, 在他游历锡兰时, 借当地土人导游, 入一小寺, 寺中有卧佛, 并说“明永乐年间, 太监监郑和曾赉法器、宝幡, 布施寺中。……华人来此者, 当以郑和为能副其职, 俾国威远施于域外。嗣后华人亦几绝迹矣”。⁶ 王韬虽未直接提及此碑, 但他在描述自己参观当地一所卧佛寺时突然提到郑和布施之事, 证明他曾亲见此碑。他还提到, 在郑和以后, 曾不断有华人来此地参观, 瞻仰郑和遗迹。这说明此碑历数百年, 一直未为人遗忘, 当地人不但知道, 且不断引领来访华人参观。清黄遵宪在其《人境庐诗草》中一首《锡兰岛卧佛》诗, 亦在诗中提及郑和。⁷ 足见直至他出洋至锡兰时, 尚知郑和当时就在此寺中或此寺附近立碑。

二十世纪上半叶向达在伦敦搜求资料时, 见此碑拓片。⁸ 冯承钧在校注

³ 伽勒位于今斯里兰卡南部之南方省 (Southern Province), 距该国最南端城市马塔拉 (Matara) 不远, 位于该城以东约 45 公里处。从伽勒沿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向北行约 116 公里, 便达该国首都科伦坡 (Colombo)。

⁴ 此碑发现经过刊于《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刊》第 1914 年号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 A. S.*)。据伯希和:〈郑和及其旅行补考〉(“Notes Additionnelles sur Tcheng Hou et ses Voyages,” 《通报》1935 年第 3、4 期), 此碑文由 Perera 首次刊在 Spolia Zeilanica 上。沙畹 (E. Chavannes) 在 1915 年的《通报》上著文介绍此碑。见陈得芝:〈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一些问题〉, 《郑和与海洋》,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年, 第 207 页。

⁵ 参见索玛斯里·戴文德拉:〈有关斯里兰卡的一些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Somasiri Devendra, “New Light on Some Arabic Lithic Records in Sri Lanka,” in *Sri Lanka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ed. by Sendake Bandaranyake, Lorna Dewaraja, K. D. G. Wimalaratne, The Sri Lanka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UNESCO and the Central Cultural Fund, Colombo, 1990), 第 217–219 页。

⁶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 11 轶;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年) 已引述, 见下册第 88–89 页。

⁷ 见上引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下册, 第 89 页。

⁸ 《文哲季刊》第 4 卷所收王古鲁译〈郑和西征考〉录有此碑汉字碑文。兹据金云铭

《星槎胜览》时曾提及其文。1959年向达在中华书局出版其校注之《西洋番国志》时，“第一次根据拓本著录”锡兰山碑汉文铭文。因未能有机会获其拓片，暂录向达刊布的碑文如下：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⁹织金绗丝宝幡、香炉、花瓶、织金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绗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绗丝宝幡肆对：内红貳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钱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钱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钱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钱金座全硃红漆钱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貳仟伍佰觔、蜡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¹⁰

向达刊布上述铭文后，国内学者首次了解郑和此次在锡兰出使时的活动细节。但向未严格按原碑逐行刊布碑文，且未提及此碑乃以汉、波斯与泰米尔(Tamil)三种文字刻成，是为憾事。此碑现存斯里兰卡科伦坡国立博物馆。笔者参加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时，曾于1990年冬造访该博物馆，并亲见此碑。当时虽然拍照存留，但未能制作拓片，无法直接使用。此后国内多人曾访问该馆，国内各种出版社中亦数度刊出此碑照片，惜均未附有拓片。故国内学界至今未能见碑文全貌。

按帕拉纳维塔纳(S. Paranavitana)1933年发表的论文描述¹¹，此石碑长144.78cm(4英尺9英寸)，宽76.2cm(2英尺6英寸)，厚12.7cm(5英寸)。其顶部雕有两龙，互相对视。汉文铭文所占幅面长106.68cm(3英尺8英寸)

〈郑和七次下西洋年月考证〉(原载《福建文化》第5卷第26期，1937年11月；此文收于《郑和研究资料选编》，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注17)。

9 向达所刊布的标点文本此处金银与织金之间不点断。按下文再次提到“织金绗丝宝幡”，并在此前提及金钱及银钱，可见金银与织金之间应当点断。

10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页。

11 帕拉纳维塔纳：《伽勒三种文字石板上的泰米尔文铭文》(S. Paranavitana, “The

寸), 宽 25.4cm(10 英寸); 泰米尔文幅面为长 53.34cm(1 英尺 9 英寸), 宽 39.37cm(1 英尺 3 英寸半); 波斯文所占幅面为长 48.26cm(1 英尺 7 英寸), 宽 38.4cm(1 英尺 4 英寸)。铭文四周饰有花纹。

按此铭文, 此碑于永乐七年(1409 年)春在中国刻成, 两年后立于伽勒。其波斯文铭文虽损坏严重, 但在提及所赠礼品的部分仍然依稀可辨, 言明布施是“为了伊斯兰之光”(to the light of Islam)。泰米尔文碑文也遵循同样的格式, 而布施的受益人是 Tenavarai nayanar 神。帕拉纳维塔纳(Paranavitana)认为就是印度教的 Devundra Deviyo。

其波斯文与泰米尔文铭文, 笔者在斯里兰卡时未能对原文作拓片, 拉丁字转写字文本亦未见, 且不识泰米尔文。幸手头的资料中有逐行记录的波斯文与泰米尔文部分的英译, 故目前只能暂时重译为汉文。其波斯文碑文之研究, 留待将来有机会得见拓片时再论。

波斯文部分(铭文共 22 行)可识部分由海德拉巴德的尼咱木领地的和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¹²解读, 其逐行内容如下:¹³

1.
2. 伟大的国君……通过皇命……明(按, 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大明皇帝遗太监郑和、王贵通等”语¹⁴)
3.已被派出以表示敬意……(按, 应对应汉文碑文之“昭告于佛世尊曰”语)
4.寻求帮助及……(按, 应对应汉文碑文之“仰惟慈尊, 圆明广大, 道臻玄妙, 法济群伦”语)
5.

Tamil Inscription on the Galle trilingual Slab,” in *Epigraphia Zeylanica*, vol. 3, No. 36 [1933]:331–341) 据上引索玛斯里·戴文德拉著〈有关斯里兰卡的一些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 第 217–219 页。

12 Mr. Kwaja Muhammed Ahmed of H. E. H. the Nizam's dominions, Hyderabad.

13 上引索玛斯里·戴文德拉论文〈有关斯里兰卡的一些阿拉伯字记录的新资料〉, 第 211、217 页。

14 郑和所立碑的汉文铭文据上引巩珍《西洋番国志》向达校注本附录二, 第 50 页; 以下同。

6. ……已知……

7. ……为了……

8. 且这些奇迹……

9. ……已被派出……

10. ……已知……致敬(按,以上诸行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遵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等语)

11. ……绣花布、香炉、花篮……及灯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谨以金银、织金绗丝宝幡、香炉、花瓶、织金表里、灯烛等物”语)

12. ……为了仁慈的恩意已经送出了这些礼品,以至于(按,应对应汉文碑文之“布施佛寺,以充供养”语)

13. ……伊斯兰之光。(按,应对应于汉文碑文中之“惟世尊鉴之”语)

14. ……礼品详见以下(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语)

15. 1 千 misqal 黄金、5 千 misqal 白银……为数 50 件装饰的物品(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绗丝伍拾疋”语)。

16. ……为数 50 件……装饰的物品 4……共计 2 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绗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语)。

17. 1 对黄色的……1 对……黄铜香炉为数 5 件(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语)。

18. 黄铜烛台(Stand)为数 5 件……5 对……饰金红色的(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语)。

19. 古灯座为数 5 件, 饰金红烛台为数 5 件……饰金木制为数 5 件(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硃红漆戗金香盒伍个”语)。

20. ……灯油……(按,应对应汉文碑文“金莲花陆对、香油贰仟伍佰觔”语)

21. ……日期……(按,应对应汉文碑文“时永乐”语)